

# 空間與身體：元豐五、六年間蘇軾 之心境反映 ——以家為考察中心\*

蔡 珮 吟\*\*

## 提 要

元豐五年至六年為蘇軾文學創作能量相當豐碩的時期，在此之間，可以發現貶至黃州的蘇軾心境由浮動轉向安穩，而其心緒轉變亦可見於其家屋書寫。本文擬由身體感與家屋空間的互涉進一步探析，以蘇軾於黃州元豐五、六年間

---

本文 109.08.15 收稿，110.01.21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謝佩芬教授「宋代記、序文專題」課堂報告，曾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 51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41 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 11 月 6 日）。本文寫作過程承謝佩芬師啟發，並得益於宋代詩文讀書會的討論，以及討論人羅珮瑄、編委會和諸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107\_(52).0003

的家屋空間與文學作品為軸，考察其於家屋中的身體展演與空間描摹，進而窺探梳理蘇軾的心境變化。可以發現，元豐五年東坡與雪堂為主要活動空間，於東坡可見蘇軾欲以老農夫的身份轉換安頓自己，雪堂內則以雪的意象封閉感官與外界的紛擾，其中都夾帶「欲」與「將」以進入平靜的企圖。而元豐六年間的南堂則呈現漸顯舒緩的空間，包括熱鬧歡快的社交網絡與日常起居逐步開放的心靈空間，都透顯著更為安然的生活姿態。藉由家屋作品的梳理，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發現蘇軾由元豐五年「追求」適然的初始點，至元豐六年時的家屋書寫中則透顯「處於」適然的曠達之情間的展現。

**關鍵詞：**蘇軾、黃州、空間、身體感、家屋

# **Space and Body: The Mentality of Su Shi**

## **During the Period of 1082-1083**

### **— A Study Centered on Residence**

Tsai Pei-yin<sup>\*</sup>

#### **Abstract**

In terms of his literary output, the period between 1082 and 1083 was Su Shi's most prolific. During this time, his literature revealed a mental state alternating between restlessness triggered by his relegation to Huangzhou and a state of tranquility. Centering on Su's residence in Huangzhou during 1082 and his writings from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 senses and his surroundings. Examining his body-centric language while in solitude and his literary depiction of the space of his abode gives insight into his journey toward finding inner peace.

In Su's writings, we can find his "eagerness" and "desperation\*" to enter a state of tranquility. For example, Su lived in Dongpo (東坡) and Xuetang Hall (雪堂). In Dongpo, he tried to change his state of mind and stabilize himself by applying himself to farm work. In the Xuetang Hall, he took advantage of the concept of snow to shield his five senses from outside disturbances, attempting

---

<sup>\*</sup>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to bring “desire” and “determination” into quiescence. A series of poems Su wrote in 1083 reveal a positive turn of events, showing that the space of the South Hall (南堂) gradually became more pleasant. For example, he developed a strong social network based around family, neighbors, and friends, and also led a more flexible life. These developments suggest a more positive state of mind. We can see Su’s mental journey beginning in 1082, with his “seeking for” tranquility. By 1083, his writing clearly shows his state of “being” there.

**Keywords:** Su Shi, Huang-Zhou, Space, Bodily feeling, Residence

# 空間與身體：元豐五、六年間蘇軾 之心境反映

## ——以家為考察中心

蔡 珮 吟

### 一、前言

「起居如何？」「起居住勝。」是蘇軾與他人書信往來中最常出現的慰問語。起居，可作日常生活之解，亦有居止住地之意。現代人簡單的「最近過得好嗎？」被夾帶入了日常生活與空間居所的意涵，並濃縮進這句慰問語之中。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人論》曾言：「空間和時間是一切實在與之關聯的架構。我們只有在空間和時間的條件下才能設想任何真實的事物。」<sup>1</sup> 可見空間與時間是我們探索歷史記憶相當重要的兩個線索。

蘇軾在元豐二年遭受人生中最震撼的轉折，便是幾近將他推進死亡牢獄的烏台詩案，案後蘇軾於元豐三年二月，抵貶地黃州。<sup>2</sup> 如王水照、崔銘所著《蘇

---

<sup>1</sup> 相關論述可參考〔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結構群譯：〈人類的空間與時間世界〉，《人論》（An Essay on Man）（臺北：結構群，1989年），頁67。

<sup>2</sup> 林語堂著，張振玉翻譯：《蘇東坡傳》（臺北：德華出版社，1979年），頁199-243。

軾傳》提及蘇軾經過最初兩年已由最艱難的境地走出，並指出元豐五年「外部環境依然沒有絲毫改善，他的心靈世界卻已大大不同於當日，一個嶄新的自我在苦難中蛻變出來……他的思想和藝術由此而昇華到一個極其美妙的峰巔。」<sup>3</sup> 吳嘉敏亦言明元豐五年為蘇軾文學創作之巔峰，以及心境轉折的重要時段。<sup>4</sup> 元豐三到五年間，蘇軾在時間的腳步下慢慢癒合，也逐漸由畏懼憂慮漸漸平定，而元豐五、六年間的細微變化，值得更進一步梳理釐清。

觀察前人研究，對於黃州時期的空間討論大多聚焦於定惠院、雪堂與赤壁，且多未涉及南堂，包括夏明宇、傅含章。<sup>5</sup> 對於雪堂的討論除了夏明宇及李天祥提及空間因素外，<sup>6</sup> 如楊勝寬則辨析〈雪堂記〉中主客問答的蘇軾思想，<sup>7</sup> 對於

<sup>3</sup> 王水照、崔銘：《蘇軾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01。

<sup>4</sup> 吳嘉敏：《元豐五年蘇軾文學研究》（吉林：吉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84。

<sup>5</sup> 夏明宇試圖以空間的建構與蘇軾對話，築起一條黃州時期蘇軾的移動線，但筆者並不以家屋為分析空間單位而將蘇軾遊覽都囊括近討論空間，對於南堂也有所缺漏。詳見夏明宇：〈對話與突圍：蘇軾在黃州的空間書寫〉，《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9卷第4期（2017年7月），頁103-110。而傅含章將分析時間斷代於謫居黃州初期，缺乏遷居於臨臯亭後的空間移動討論。詳見傅含章：〈論蘇軾寓居定惠院之生活與心境〉，《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3期（2008年12月），頁111-131。

<sup>6</sup> 李天祥以家屋為考察中心，也討論黃州時期的家屋空間，包括定惠院、臨臯亭與雪堂，並分別點出定惠院時期的蘇軾展現出的是一個驚懼並禁錮的靈魂，臨臯亭則展現蘇軾於黃州一個重大的轉折，顯現出絕境的突破。雪堂則分別展現蘇軾的淵明情節與該時期的不安心境。但本論文中臨臯亭未討論此空間中亦展現出恐懼與悲苦的情緒，而對於雪堂內部空間的討論則集中討論〈雪堂記〉中主客問答的思想辯證，蘇軾對空間的描寫方式反映的蘇軾心境未著墨，此外，對於南堂空間的建構亦簡單帶過，未深入討論。詳見李天祥：《蘇軾的「際遇」與「懷歸」——以時間、空間為主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

<sup>7</sup> 楊勝寬以〈雪堂記〉為討論中心，深入探析其中展現蘇軾的適與不適的煎熬與自我辯答，並進一步擴充至中國士人的抉擇轉換以及宋代的時代背景。詳見楊勝寬：〈雪堂記與蘇軾黃州適意的貶謫生活〉，《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7期（2011年7月），頁1-7。

空間建構連結蘇軾心境變化的較為缺漏。〈南堂五首〉則沒有專篇討論，<sup>8</sup> 大多只侷限於清雅詩作的評價。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藉由「家」的空間建構與其延伸日常居址之描寫試圖切入蘇軾貶謫之心境，其中包含現實家屋空間的描摹與包裹蘇軾生活日常兩個層面。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中將空間視為自我意識的居所，家屋的意象連結個人的親密、快樂或者孤獨、悲傷，人與空間的關係相互建構與成就，藉由實際空間得以潛入作者內心的情感隱含。<sup>9</sup> 而居所空間在宋代亦有其時代意義，基於當時文人壺中天地的風潮，<sup>10</sup> 天地之中，文人得以「避開了塵世的擾攘，卻仍能享受著人間的清福。」這種時代意識亦刻畫在蘇軾的居所之中，使家屋成為其躲避外界紛擾並安放身心的處所。

隨著蘇軾居住空間的不斷轉變，相應的心境也時常展現於他的空間書寫中。蘇軾在黃州的住屋空間有四，先是元豐三年二月初抵黃州時所借住的定惠院，此時蘇軾的心情多為抑鬱愧疚，並展現在定惠院的相關篇章中。<sup>11</sup> 短居四個月後因家人入住遷居至臨臯亭，臨臯亭相關書寫反映他初遷臨臯亭時延續貶謫不

<sup>8</sup> 黃啟方〈「東坡居士」與「山谷道人」〉一文中對雪堂與南堂皆有考證，指出南堂興建緣由，以及雪堂的功能多作為讀書寫字、飲宴或接待賓客之居所。詳見黃啟方：〈「東坡居士」與「山谷道人」〉，《詩人·美人·文人：唐宋文學十一題》（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頁24-25。

<sup>9</sup>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05年3月）。

<sup>10</sup> 「宋代傳統隱逸思想的轉變，在結合於兩宋世人心目中日益縮小的宇宙世界、文化的轉向內在開掘和精微細膩，從而又出現了把園林與壺中天地、須彌介子的美學概念聯繫起來的所謂壺天之隱。」藉此文人得以得到心裡的安寧。參見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36。

<sup>11</sup> 關於定惠院相關的篇章相當多，包括〈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安國寺浴〉、〈安國寺尋春〉、〈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等，詞作如〈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傅含章對蘇軾此時期的篇章做深入考察，並認為此時期的他展現的心境不外畏懼抑鬱、內省愧疚、嘆老思親。見傅含章：〈論蘇軾寓居定惠院之生活與心境〉，頁111-131。

安的心境，亦乘載元豐五年大雨後蘇軾失落絕望的心靈。延續著臨臯亭的家居性質，在元豐六年五月在南邊所建南堂則展現蘇軾元豐六年的身心狀態。此外，蘇軾最具性徵地位的家屋便是元豐五年二月於東坡所建立的雪堂，雪堂與東坡皆為他獨處時安放心靈的重要空間。空間往往成為包裹人類活動以至於身心安放的對象，他來回穿梭這些空間，而不同的空間對象也包裹當下他的所有，成為他安放並保護自己之處。因而他如何描寫、塑造這些貼近他生命的家屋空間，又在其中反映蘇軾的哪些生命快樂與憂愁，便相當值得進一步探詢。

除了蘇軾對於家屋空間的書寫方式外，其居於房屋內外的身體姿態與其日常起居，包括社交網絡與移動空間的拓展都包裹著家的意象，相當程度的顯現蘇軾之心境。「透過意象性的原始運動，這樣身體投向世界，身體才活出了時間空間的整體，以身體感的在場帶動了生活時間與空間的感受，並將這些感受編納入經驗之中，讓這些經驗在時空轉換後人得以回返。」<sup>12</sup> 本文試圖由身體感與空間的互涉進一步探析，<sup>13</sup> 以蘇軾於黃州元豐五六年間的「家」為核心概念，試圖由身體展演與空間描摹的角度解析蘇軾於此時期的的心境反映。並希冀由家屋空間雪堂，延伸蘇軾於黃州的重要活動空間——東坡，考察蘇軾五六年間的乘載意義。後依循著時間軸發展，討論臨臯亭至於南堂建立後蘇軾展演出的心境轉折，並由此拉出一條由元豐五年連結至六年隱然作用的時間線，藉由對此空間的描寫形式與於居址中的日常活動探索此時間斷代些微不同的空間建構與心靈狀態。

<sup>12</sup>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年），頁78。

<sup>13</sup> 本文受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啟發，進而欲以身體與空間的關係重新切入文本討論。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年12月），頁257-272。

## 二、籓之內／外——淵明的東坡之志與窩巢般的雪堂空間<sup>14</sup>

元豐五年，蘇軾以臨臯亭、東坡與雪堂為其「家」的主要建構空間，其中，東坡與雪堂反覆出現於其作品、書信之中。而根據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空間理論，<sup>15</sup> 空間因人們的日程行為操演而有了意義，空間的形成實由空間使用者的身體延展而來。因此筆者除審視蘇軾如何建構空間環境外，亦關注其日常行為操演及舉止間體現的身體感，臨臯亭則於下個章節再作討論。

### （一）東坡與陶氏田園寄託

東坡處地之高，陸游《入蜀記》曾記錄其遊東坡的景致：「游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sup>16</sup> 可見東坡雖鄰於坡上卻地勢開闊，合宜種植作物並具廣闊的視野。蘇軾在〈東坡八首·敘〉中自言「余至黃

<sup>14</sup> 這裡借用巴舍拉《空間詩學》中的窩巢概念，巴舍拉認為即便是充滿光明的家屋中，幸福的意識狀態仍舊渴望藏身於巢穴的動物相比擬，回到庇護所的原初狀態是人天生的趨向，基於生物躲藏的特性而嗜好蜷縮、匿跡或是隱蔽。這裡沿用窩巢的概念，進一步延伸討論，可以發現家屋作為人躲藏與隱蔽的場所並不完全只有巴舍拉認為的幸福感，亦可能仍感到恐慌懼怕，但庇護所仍提供隱蔽的功能，如同動物躲回窩巢一般。而蘇軾也將雪堂作為藏身的窩巢，因此借用其概念作為譬喻。〔法〕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 171-187。

<sup>15</sup>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為法國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家，1960-1970 年發表與都市和空間的論述，並在 1991 年發表 1974 年的空間理論代表作《空間的生產》英譯版，許多書評與學術論著詮釋其思想的作品，在日後學界陸續出現。相關理論可參閱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一書。書中以休憩的公園、商場或是運動場為例，說明這些空間都會因為人們不同的行為活動，一方面強化了空間的使用價值，同時形成了特定的空間面貌。可見空間與人的行為是互設並相互成就的。詳見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sup>16</sup> 宋·陸游：《入蜀記》，收入王民信主編：《宋史資料粹編》第 4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卷 4，頁 107-108。

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sup>17</sup> 可見這塊得來不易的土地開耕過程並不輕鬆。蘇軾在《東坡八首》中對於東坡的稱呼多為「廢壘」、「頽垣」、「荒田」以強調其荒與廢，顯現蘇軾從無到有所投注的心力，更甚至以東坡自號，都透顯著東坡之於蘇軾的意義。

在開墾東坡的勞動開始後，來回住處臨臯亭與東坡間的奔波讓蘇軾興起建屋的念頭。在朋友幫助下他得以「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sup>18</sup> 接續東坡的開墾，蘇軾得一廢圃後於東坡南方處建起了雪堂，「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sup>19</sup> 雪堂東邊植有一棵柳樹，南邊則有小橋。雪堂實際上只是五間由割草建成的草屋，雖當時他人多半認為雪堂相當簡陋，<sup>20</sup> 但此處卻成為承載蘇軾豐富情感的場域，此外亦可見東坡與雪堂地處相當接近。東坡之功能為「種蔬接果」，<sup>21</sup> 甚至「桑百餘本，身耕妻蠶」，<sup>22</sup> 是為蘇軾以勞動換取心靈平靜的田園。蘇軾置身其中貼近農地勞動卻不嫌苦悶，如與王定國的書信中便提及「近日方得雨，日夜墾辟，欲種麥，雖勞苦卻亦有味。」<sup>23</sup> 躬耕的身體勞動似乎帶給蘇軾生活的踏實感，而勞苦之間亦透顯著他的淵明情節。

<sup>17</sup> 宋·蘇軾：《東坡八首》，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頁887-894。後文簡稱為《蘇詩彙編》。

<sup>18</sup> 見宋·蘇軾：〈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二，《蘇詩彙編》，頁941-945。

<sup>19</sup> 宋·陸游：《入蜀記》，卷4，頁108。

<sup>20</sup> 宋·蘇軾：〈哨遍·敘〉：「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宋·蘇軾著，清·朱孝臧編年，龍榆生校箋，朱懷生標點，《東坡樂府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2年），頁175-176。後文簡稱為《東坡樂府箋》。

<sup>21</sup> 宋·蘇軾：〈與子安兄〉，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6615。後文簡稱為《蘇軾全集校注》。

<sup>22</sup> 宋·蘇軾：〈李公擇十七首之九〉，《蘇軾全集校注》，頁5614。

<sup>23</sup> 宋·蘇軾：〈與王定國三十五首之十三〉，《蘇軾全集校注》，頁5696。

東坡與雪堂時常如連體嬰般一同出現在蘇軾的文學作品或書信中，例如〈哨遍·敘〉中所言「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sup>24</sup> 又如〈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中「東坡數間屋」，或是與李公擇的書信中提及「某間在東坡，……。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sup>25</sup> 都可探知東坡與雪堂皆為蘇軾此時重要的活動空間。蘇軾以東坡為半徑畫出一塊自處的空間，而在他的詞作中更清楚的顯現他對東坡的寄寓精神。如〈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中便可窺見蘇軾在面對謫居黃州的困境時，試圖以陶淵明的躬耕田園安撫自己躁動的心靈：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餘齡。<sup>26</sup>

詞中除了描摹雪堂外的景色與空間樣貌，更展現對陶淵明的寄託。<sup>27</sup> 雪堂西畔的泉水透著清脆的鳴響、斜山與溪水既傾且橫跨眼前，他方的亭子與遠方孤秀

<sup>24</sup> 宋·蘇軾：〈哨遍·敘〉，《東坡樂府箋》，頁 887-894。

<sup>25</sup> 宋·蘇軾：〈李公擇十七首之九〉，《蘇軾全集校注》，頁 5614。

<sup>26</sup> 宋·蘇軾：〈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東坡樂府箋》，頁 165-166。

<sup>27</sup> 李天祥在論文中便曾以此詞解析蘇軾雪堂與陶淵明之間緊密的關係，他認為這樣的連結印證蘇軾極力以定居雪堂比擬陶淵明歸田的意圖。見李天祥：《蘇軾的「際遇」與「懷歸」——以時間、空間為主軸的考察》，頁 171-172。另也有許多前人寫過專篇討論蘇軾與陶淵明之間的關係，如何阿珺由二人的生活環境與大時代背景切入分析其歸田之意有所不同，陶淵明出於自我意願回歸自然與本真狀態，而蘇軾則是藉由此歸田試圖面對及探索命運多舛的人生，是一種解脫，但同時也是掙扎與尋求。見何阿珺：〈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2009 年 10 月），頁 54-62。舒韶雄則聚焦於陶淵明〈游斜川〉與蘇軾〈和陶游斜川〉兩篇文本深入探析二人

的城牆都與當年淵明所遊形成畫面的折射，蘇軾仿若以外在山水將雪堂與當年的斜川的影像重合，重合之際，顯現了蘇軾企圖藉由山水之景與躬耕勞動將自己的形象與陶淵明契合。詞末「吾老矣，寄餘齡」對於時間的唏噓之感，正好與〈遊斜川並序〉中「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sup>28</sup> 相互映照，淵明對時間不留的悲傷鮮明地透過文字顯現出來。由此觀蘇軾詞對於「老」與時間的焦慮隱隱作用其中，提醒著蘇軾他已不再年輕。而對陶淵明的喜愛絕不僅止於斜川游的景色重合，蘇軾更是將自己的形象和身份皆與陶淵明作扣合。如與朋友王定國的書信往來中半自嘲卻也半聊表自己的淵明情節：「欲自號鑿糟陂裡陶靖節，如何？」<sup>29</sup> 在其作品中也可發現他不斷以老農夫自居，<sup>30</sup> 除了形象與陶淵明隱隱重合之外，更潛藏著蘇軾將陶淵明作為寄託對象的意圖。

蘇軾對於陶淵明的傾慕在許多作品中皆可窺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人田居差異在於躬耕的動機。何阿珺認為陶淵明出自自我意願回歸自然，而蘇軾則是以歸田面對命運的多舛，躬耕是一種解脫，亦是掙扎與尋求。<sup>31</sup> 由此來看，蘇軾藉由躬耕田園梳理心情並試圖從謫居困境中脫逃。而方瑜則認為蘇軾傾慕陶淵明的原因除了淵明能拋卻現實利害與他人毀譽之目光，僅以自由意志考量其本性之真與任性展現外，更對陶淵明存有一種文人潛藏的競爭與影響焦慮。<sup>32</sup>

---

於社會環境、人生經歷與性格影響下比較二人於此既相似又各有獨特風格。見舒韶雄：〈景似情殊 境同感異——陶淵明〈游斜川〉與蘇軾〈和陶游斜川〉比較閱讀〉，《湖北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2006年3月），頁10-13。

<sup>28</sup> 東晉·陶潛：〈遊斜川並序〉，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4。

<sup>29</sup> 宋·蘇軾：〈與王定國三十五首之十三〉，《蘇軾全集校注》，頁5696。

<sup>30</sup> 如〈好事近·黃州送君猷〉中提及：「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淒切」，《東坡樂府箋》，頁215。

<sup>31</sup> 何阿珺：〈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頁54-62。

<sup>32</sup> 方瑜引用美國文學家卜倫的批評觀「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切入討論蘇軾對於陶淵明的競爭心態。所謂影響的焦慮係指「成為偉大作家的慾望，就是在

由此來看，陶淵明似乎成為一種理想典範，蘇軾在以陶淵明為寄託的同時，亦存在某種文人的競爭意識，於是在複雜的情緒下，蘇軾試圖以雪堂與東坡作為寄寓之處處理自己騷動的內心狀態。而這樣的期待與努力，最終都在同年春天一場長達兩個月的大雨中被澆熄。

## （二）寂寂靜止之際：雪堂乘載之意象

此時期蘇軾另一重要活動空間為雪堂，雪堂的功能性已有許多討論。首先〈雪堂記〉中言「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sup>33</sup> 其中「居」與「所居」可見得他將此處作為臨臯亭外另一居止空間，更甚者，具有壺中天地成分。據李天祥的考證，東坡與家人應大多仍居於臨臯亭，由〈哨遍〉詞中「門前笑語喧童稚」、「親戚無浪語」可見雪堂亦具有家居空間的替代功能。<sup>34</sup> 而蘇軾時常來回雪堂與臨臯亭之間，如〈臨江仙·夜歸臨臯〉「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sup>35</sup> 其中提及他在雪堂夜飲，醉後三更半夜才回到臨臯亭。〈後赤壁賦〉則提及：「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亭。」<sup>36</sup> 可見大部分時候蘇軾應仍將臨臯亭作為主要的居所，偶爾才移居雪堂，此外，雪堂亦是蘇軾接待賓客的重要空間，<sup>37</sup> 可見雪堂兼有蘇軾家屋、社交與獨處空間的性質。

自己的時空裡，在原創、傳承和影響焦慮必得相濡以沫的情形下，動身前往他方的慾望」。而對於蘇軾而言，陶淵明既是隔代知己，亦是他競爭心態下創作的潛在推力。見方瑜：〈抉擇、自由、創造——試論蘇東坡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0 年 5 月），頁 5-26。

<sup>33</sup> 宋·蘇軾：〈雪堂記〉，《蘇軾全集校注》，頁 1308-1318。

<sup>34</sup> 李天祥：《蘇軾的「際遇」與「懷歸」——以時間、空間為主軸的考察》，頁 170。

<sup>35</sup> 宋·蘇軾：〈臨江仙·夜歸臨臯〉，《東坡樂府箋》，頁 190-191。

<sup>36</sup> 宋·蘇軾：〈後赤壁賦〉，《蘇軾全集校注》，頁 39-44。

<sup>37</sup> 王水照、崔銘《蘇軾傳》提及：「雪堂常用來接待遠道來訪的朋友，蘇軾自己夜間主要還是和家人一起住在臨臯亭。」見王水照、崔銘：《蘇軾傳》，頁 283。而黃啟方亦指出蘇軾並未遷居雪堂，雪堂僅作為讀書寫字或接待朋友的居所。見黃啟方：〈東坡

雪堂主要的空間建構與意義可由〈雪堂記〉窺知一二，首段便能看見蘇軾如何建構雪堂內部，而蘇軾置身其中又展現何身體姿態：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空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sup>38</sup>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蘇軾藉由第三人稱開啟並貫穿全文，以蘇子為代稱將他與主客對話間拉出距離，夾帶著客觀姿態試圖在文章中保持超然的理性態度。而蘇軾對自己的形象塑造也相當有趣，「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動作與神態似乎遙遙的與《莊子·齊物論》中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sup>39</sup>的樣貌不謀而合，可見蘇軾對「蘇子」的形象塑造為獨立於世並飄然於塵，甚至近於客口中的「散人」，這樣的書寫似乎也隱然可見蘇軾對自己的期待與寄望。

接著，審視雪堂的內部空間建構。雪堂由一片「廢圃」築地而起，從荒蕪中建構的情形從東坡的整理便可窺見，此二地皆從「廢」與「荒」的狀態重新建築，平地而起的過程絕對不輕鬆。而由荒田與廢圃築起，此「廢」與「荒」又何嘗不是蘇軾對於內心狀態的一種擬態？若將雪堂與東坡進一步看作蘇軾對於自身的建構，他如何塑造空間，實際上也投射著自己。詞作中可見東坡開闊的景致透顯著淵明情致，而雪堂內部則呈現了封閉的樣貌。首先「築而垣之」可見雪堂外更

居士」與「山谷道人」》，頁 24-25。

<sup>38</sup> 宋·蘇軾：〈雪堂記〉，《蘇軾全集校注》，頁 1308-1318。

<sup>39</sup> 晉·郭象注，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3。

以矮牆環繞，建築外部藉層層防禦築起，房屋的牆壁之外還有一環狀矮牆，更突顯重重的保護意象。而住屋內部則是以雪如同密織細網覆蓋整個時間與空間，「起居偃仰」之間將時間拉長為終日，「環顧睥睨」則藉由視角的轉動將空間皆佈滿雪的意象，這種包覆性實際上也包裹住蘇軾的內心狀態，並且「無空隙也」更展現出一種無所容的壓迫感，全然罩網住蘇軾的身體。在此堂之內，雪毫無破綻的侵佔空間與蘇軾的心靈和身體。進一步爬梳〈雪堂記〉全文，可以發現蘇軾對空間的描繪多聚焦內在環境，這樣的內文安排似乎透顯著對內探析之感，蘇軾此時對於時間的焦慮、人間志業的追求落空，或者離政治中心漸遠的時空距離都讓他難以舒放內心的膠著，於是〈雪堂記〉中通篇藉由主客問答辨析自己如何安頓內心與困境，皆是獨處式的自我詰問。

另一有趣的是雪堂層層築之的牆實際上存在著雙重性。蘇軾藉由房屋的疆界一方面為自己豎立起一道防禦線，包括光線、聲響與他人都被拒於門外不得進入，此疆界性讓他保有自我空間的安全感，得以紓緩烏台詩案中終日恐懼與惴惴不安之心。另一方面，這道空間的阻隔卻也將蘇軾困於室內，甚至物理的疆界仍不足讓他放下恐懼與防禦心，他還得遁逃入夢境之中。「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可以發現蘇軾於夢中「栩栩然」感到歡欣不已，夢醒後反而若有失焉，不禁讓人好奇蘇軾所失為何？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夢的解析》中將夢境界定為「一種願望的達成。」<sup>40</sup> 也就是現實中無法達成的希冀與理想，在萬有可能的夢境中皆可成真。何海瑄認為「夢」在黃州時期象徵著蘇軾心中寧定的境界，並透過化覺為夢的方式建構夢境以安定心靈。而「覺」作為夢境的另一端，則代表著滿是荒蕪繁雜的俗事，是令人想遠離的空間。<sup>41</sup> 由此來看，夢境成為蘇軾逃離現

<sup>40</sup> 〔德〕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頁37-47。

<sup>41</sup> 何海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實的一個場域，夢境中的他歡欣愉悅，這恰恰是因為現實中的他無法擺脫政爭下的恐懼與無奈，勢必得藉由夢境才能達到他希冀的平靜與安寧。因此夢醒後的他「若有失焉」，似乎對於夢的美好仍然留戀，而他「以掌抵目」的身體姿態可見其仍回望著夢境。夢覺之間，顯現的是蘇軾對於現實的抗拒，也帶出現實世界的一切皆恍然如夢的幻滅感，即便再不願意，他仍得離開夢境的保護回到現實的黃州小堂之內，面對無可逃避的苦痛。

如上所述，〈雪堂記〉中的蘇軾身體是被限制於空間之內的，且這樣的限制出於蘇軾的自主意願。這裡展現出的無法移動與困牢於雪堂內部當然也受季節影響，因冬末初春的料峭寒冷抑制住了蘇軾的對外探索。但更深一層來看，蘇軾主動將空間內部以雪作為裝飾，甚至「無容隙也」，從其舉動似乎可窺探蘇軾內心的防備，他更試圖以「不遯而僂，不寒而慄，淒凜其肌膚」等肌膚感受凍結自己，進而凝凍住時間與自身的毛細。有趣的是，居處於雪堂的感官感受並非舒暢歡快，反而是以近乎痛苦的「不遯而僂，不寒而慄」，難以呼吸與顫慄的心理感受不恰好就如同蘇軾初被貶謫的黑暗與恐懼籠罩嗎？藉由不斷虐待式的空間居處凝結感知，以身之寒與靜企圖達至內心的沉靜，達到安放身心的效果。但這樣的過程卻非想像中的愉快，反而形成某種弔詭性。另外，客亦以人處於空間中的感官言「雪之白」讓人「恍然而目眩」，「雪之寒」則「悚然而毛起」，藉由感官表達了依恃物質的困窘，而這種感受似乎也與蘇軾自己所言的「不遯而僂，不寒而慄」有相互呼應之處。藉由這些外在感官的寒與凍與寂靜的白，可見他所求的只是「靜」而已。此「靜」包括大雪包圍營造出來寧靜的視覺感、與外界隔絕後連時間都停滯的聽覺效果，甚至達到內心的平靜與無波瀾，這才是他建築雪堂最終的目的。如同他於文中提到「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堂為靜。」

靜則得，動則失。」<sup>42</sup> 以追求心靈上的安穩與寧靜。而另一個層面來看，這樣的「靜」似乎也代表一種時間意識的泯滅。夏明宇認為蘇軾以雪修飾牆壁是「借助時間的凝固來對抗時間的流逝，進而尋獲遺世獨立的自我存在感」，並「刻意消泯現實時間的存在，從而減輕因時間流逝帶來的恐懼。」<sup>43</sup> 這樣的時間焦慮橫貫元豐五年，並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發現他試圖對抗時間消逝的悲涼與恐懼，包括同年所作〈念奴嬌·赤壁懷古〉與〈赤壁賦〉皆可探知蘇軾此時的時間焦慮，<sup>44</sup>「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歷史瞬滅感讓蘇軾的存在更顯渺小，滔滔不絕流動的江水與歷史間，蘇軾面對快速地流逝間感到荒涼與恐懼。面對人類千古皆有卻難以克服的時間難題，蘇軾不但藉由出遊與山水為鏡，在對話間不斷地審視自己與面臨的困境，也在自己的居所以雪的意象對抗，藉此處理內心的浮動與不安。

巴舍拉認為即便是充滿光明的家屋中，人類仍舊渴望藏身於巢穴，基於生物躲藏的特性而嗜好蜷縮、匿跡或是隱蔽，回到庇護所的原初狀態是人天生的趨向。<sup>45</sup> 實際上，〈雪堂記〉展現出一個毫無縫隙得以侵入的密閉空間，如同巢穴一般，成為蘇軾蜷縮其中安放自己的空間。而這空間也間接展演了蘇軾內心的防衛機制，這種封閉性一直到篇末的詩歌才帶來些微縫隙。篇末的歌頌體帶有強烈個人情致的寄託，「兮」字的運用帶出歌唱體的誦讀之氣，宛若蘇軾躍身吟唱並娓娓將情繫於詞語之間，吟唱聲線仿若光線潛入塵粒遍佈的空氣之中，「性之便，意之適」只在於吾人輾轉之後仍可見「大明既升」因而得以觀「曉隙之塵飛」，蘇軾藉由歌詞織理出縫隙之中光塵共同浮動之景，一切緣於夜晚的漆

<sup>42</sup> 宋·蘇軾：〈雪堂記〉，《蘇軾全集校注》，頁1308-1318。

<sup>43</sup> 夏明宇：〈對話與突圍：蘇軾在黃州的空間書寫〉，頁103-110。

<sup>44</sup> 見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東坡樂府箋》，頁183-186。宋·蘇軾：〈赤壁賦〉，《蘇軾全集校注》，頁27-39。

<sup>45</sup> 〔法〕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171-187。

黑之後，萬物群動之氣息、初升之光都象徵一種希望與可能性。蘇軾藉由這種歌頌體置於文末除了帶出抒情性外，亦可見得其中顯現的「未達」而「希冀」之情。而最終，蘇軾隨客一步踏出雪堂，似乎象徵著他將要朝向無所依恃的散人前進。

### （三）時間推進：雪堂乘載之轉變

元豐五年二月雪堂初建後，蘇軾不論在記體文、詩詞或是與他人往來的書信中都可頻繁見到雪堂的空間身影，上文以雪堂內外建構與蘇軾置身其間的身體姿態為析，可見蘇軾即便已在黃州一年，仍很難完全逃脫烏台詩案的陰影與憂愁。有趣的是東坡與雪堂除了建構、寄託有所不同，連蘇軾對自己的形象塑造也差異極大。東坡上蘇軾時常以日照面黑且勞苦的躬耕老農夫現身，藉由人與土地緊密相連試圖忘卻現實的荒蕪。而回到雪堂重重界線之內，蘇軾的形象又變為急欲超脫世事近似《莊子》典中的散人模樣。兩個形象塑造看似相差甚遠，卻直指同一核心，便是希冀藉此脫離現實紛擾、政事與宦海浮沈的煩憂，不論是農夫也好、散人也罷，蘇軾希望找到一個儒家典範之外的身份與形象安頓自己，藉由身份的轉換脫離原先在官場遭受迫害的記憶與恐懼，更是希望抽身其中並在黃州這塊荒蕪貧脊的土地重新展開生活。因此不論從相關詞作或是〈雪堂記〉中，都可以找到串連的線索顯示此時，不論東坡躬耕寄寓的陶氏之意或雪堂間試圖安頓內心的自我詰問，都帶有「欲」與「將」的企圖，企圖處理並面對謫居的失落心理與現實經濟困境，但這樣的「將」卻是處在「追求」的階段而未能達到「安放」的階段。

但這樣的狀態並非固著，隨著時間推移，可以發現蘇軾對於雪堂的描寫也逐漸帶出安放釋然的書寫模式。元豐六年後蘇軾已較少專寫雪堂的作品，但在詩詞與書信之中仍可時常發現雪堂的身影。如元豐六年正月的〈六年正月二十

日復出東門乃用前韻〉便有「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就巢痕」之語，<sup>46</sup> 此詩最尾兩句「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雖具期待再受啟用之希冀，卻顯得相當溫厚蘊藏，包括詩名中的「復出東門」中藏有出門尋春與梅花再開的意象都相當符合紀昀之評的「溫雅可誦」。但再細讀便可知此詩主軸落在「終老計」一語，五畝指的應是東坡，對於土地的勞動與日復一日地翻土栽種，由身體動作進而寬慰心靈，並就此延伸人與土地之間的溫厚連結關係，此時蘇軾與此地的關係已不再只是一種寄託，而藉由時間的逝去，歸老也從寄望變成了真實。所謂「漸成」更可見這樣的狀態是逐漸而成，非一蹴可幾。且接見下語「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一是謫居以來對此處的環境與活動熟悉到成為身體記憶，如同方回所評：「坡翁一謫數年，甘心于漁樵而忘返也」，<sup>47</sup> 並由此回扣「終老計」一語，更顯現出蘇軾的隱居東坡雪堂的趨向。

時間再推移至元豐六年七月的〈初秋寄子由〉則提及：「買田秋已議，築室春堂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sup>48</sup> 除了可見蘇軾與蘇轍之間親密的兄弟情，亦可以側邊觀察該時對黃州謫居的心境狀態。詩中提及已有買田築室之意，暗示著蘇軾萌生終老於此的田居生活意向，而以往的淒風慘雨帶來的愁苦之情被淡化，如今即便細雨包圍雪堂，詩前半部雖仍由「兩衰老」與「失途」扣合，顯現蘇軾在秋風淒厲的淒然興感，詩末卻轉入退隱安居之感，將西風之悲化為與子由共約退隱的溫厚之語。其中「對床聲」一語來由可見蘇轍〈逍遙堂會宿二首·引〉：「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將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由此來看，此語實為蘇軾與其弟蘇轍之間的密語，反覆出現在二人唱和的詩作之中並

<sup>46</sup> 宋·蘇軾：〈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乃用前韻〉，《蘇詩彙編》，頁 957-959。

<sup>47</sup> 元·方回著，李慶甲集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上冊，頁 373。

<sup>48</sup> 宋·蘇軾：〈初秋寄子由〉，《蘇詩彙編》，頁 968-970。

貫穿生命，撫慰彼此。<sup>49</sup>這是一個年少時期寓居京城懷遠驛時便立於兄弟間的約定，退隱之情由年少時便埋下種子，並因貶謫與政治失意反覆的催促發芽。這種退隱的念頭亦萌現於〈臨江仙·詩句端來磨我鈍〉中：「應念雪堂坡下老，昔年共採芸香。功成名遂早還鄉。回車來過我，喬木擁千章。」<sup>50</sup>可見蘇軾的退隱之情縈繞在元豐六年間。姚明今與徐宇春便認為〈初秋寄子由〉中展現了歸居田園的願望。<sup>51</sup>在這裡，對床眠更像是蘇軾對蘇轍的一紙邀約，邀請蘇轍一同歸隱並共享閒居之樂，而閒居的場域便是雪堂。在此，雪堂也化身轉換為蘇軾歸隱之象徵。更透顯了他希望就此安老，接受謫居事實的心境展現。

即便在元豐六年之後的作品也可以窺見雪堂書寫模式的轉變，但鳳毛麟角中似乎只能發現蘇軾逐漸放鬆的心境，不能更進一步體證蘇軾轉化的心情。而攀循著時間軸則可以發現其元豐六年的心境轉折在蘇軾的另一座新建居所得到的應證，也就是該年由好友蔡景繁出資、出力於臨臯亭南側所建之南堂。

### 三、從空間到心靈——臨臯亭至南堂的新版圖

隨著時間線的向前推進，雪堂書寫也逐漸展演出不同的樣貌，但卻因元豐六年缺乏專篇描寫雪堂的作品，而未能更全面的探析此時期蘇軾家屋的書寫改變，但這樣的轉變在另一組詩〈南堂五首〉得到更全面的詮釋。不同於雪堂之於蘇軾的空間意義，臨臯亭與後建的南堂則乘載著另一層家屋意義。在此家屋意

<sup>49</sup> 姚明今、徐宇春以蘇軾與蘇轍唱和詩歌中的「對床眠」作為線索，認為此於是二人情感深厚的特指符號，此意象下蘊含著蘇軾對仕宦生涯的隱憂、人生流逝的感傷與歸居田園的情結，也反映了蘇軾對人生的思考與對兄弟之情的眷戀。見姚明今、徐宇春：〈蘇軾夜雨對眠意象闡釋〉，《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5期（2007年10月），頁559-563。

<sup>50</sup> 宋·蘇軾：〈臨江仙·詩句端來磨我鈍〉，《東坡樂府箋》，頁367-368。

<sup>51</sup> 姚明今、徐宇春：〈蘇軾夜雨對眠意象闡釋〉，頁562。

義底下，亦可於書寫空間的方式與蘇軾於其中的身體展演出其心境變化，下文將以臨臯亭與南堂的空間環境與建構切入，並以南堂為中心討論元豐六年後蘇軾心境的展現。

### （一）外在空間建構：臨水而居的臨臯亭與南堂

蘇軾於元豐三年二月一日抵貶地黃州，家眷則於五月二十九日抵達，因居住人數增加，他們搬離了短居的定惠院來到了臨臯亭。臨臯亭原為官用驛站，作為官員走水路時暫居的場所，此處便是蘇軾與家人於黃州長時間共居的場域。此處不但簡樸，更有些無法克服的地理位置缺陷，在蘇軾與陳季常的書信中有言「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sup>52</sup> 西曬屋子的體感焦灼勢必不適宜居住，幸好臨臯亭擁有相當優美的景緻。臨臯亭是於一壟高之處所建的屋子，「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且「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sup>53</sup> 由此可知此處視野廣闊並山水相依，也為黃州時期的蘇軾開拓了一方天地。大江大水的意象不斷穿梭在蘇軾對臨臯亭的描寫，大江對岸的武昌群山環繞之景，也讓蘇軾得以在陋屋之間尋得些許歡快。<sup>54</sup> 此處，大江對於蘇軾來說可梳理兩層意義，一為家鄉之水的家居意義，此時的蘇軾遠離故鄉也從理想的政治中心被驅逐，內心勢必慌恐不安。此時可以安慰他的除了身邊的家人外，便是源於家鄉峨眉雪水的滾滾長江。乘載著家鄉之水的意象流過臨臯亭之前，似乎藉由江水將遠在二地的空間位置快速繫連，讓遠在千里外的蘇軾感受來自故土的寬慰。另一層面，大水廣闊景致帶來的舒暢感也時常出現於

<sup>52</sup> 宋·蘇軾：〈與陳季常十六首之五〉，《蘇軾全集校注》，頁 5874。

<sup>53</sup> 宋·蘇軾：〈范子豐八首之八〉，《蘇軾全集校注》，頁 5424。

<sup>54</sup> 包括〈與王慶源十三首之五〉、〈與朱康叔十七首之五〉、〈范子豐八首之八〉、〈答吳子野七首之四〉、〈與上官彝三首之三〉、〈與司馬溫公五首之三〉幾首皆提及臨臯亭距離江岸僅數十步之遙，多寫臨江而居及，可見大江對蘇軾的特殊地位。

相關書寫中，「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風濤掀天。」<sup>55</sup> 可見臨臯亭位於江邊的廣闊景致，僅要稍步出家門便能俯視大江、見得斷崖般的動魄驚心，而浪濤滾滾與天邊相互暈染成一幅浩蕩之景。此外，「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咫尺，時復葉舟縱游其間。風雨雲月，陰晴早暮，態狀千萬。」<sup>56</sup> 這樣的地理空間也便於蘇軾於空閒時分藉扁舟出遊，徜徉在流水之間彷彿無所牽掛亦自由無拘。

扁舟出遊最著名便是〈前赤壁賦〉與〈後赤壁賦〉所記，藉由自然山水風光寄寓內心，可見鄰近大江的居所空間部分寬慰了蘇軾創傷的心靈。但臨臯亭展現的絕不止蘇軾舒暢歡快地一面，亦相應他的愁苦悲傷。例如元豐三年剛遷居臨臯亭時所作〈遷居臨臯亭〉云「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穩坐。」<sup>57</sup> 展現的是貶謫黃州的惴惴不安，以及對生命無以掌握的無奈之感。元豐五年三月，蘇軾更遭遇東坡開墾後的最大挫折。那年春雨不斷下了兩個月，所有作物幾乎毀於一旦，〈寒食詩〉二首與〈徐使君分新火〉皆記錄了大雨之下蘇軾內心的絕望與悲苦，也讓他在黃州的心瞬間墮至谷底。〈寒食詩〉中「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而「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sup>58</sup> 小屋應指臨臯亭，僅離大江八十餘步的地理位置固然讓他擁有了一級風景，但同時也存在著急雨暴漲的風險。如陸游提及：

<sup>55</sup> 宋·蘇軾：〈答吳子野七首之四〉，《蘇軾全集校注》，頁 6349。

<sup>56</sup> 宋·蘇軾：〈與上官彝三首之三〉，《蘇軾全集校注》，頁 6290。

<sup>57</sup> 〈遷居臨臯亭〉中「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穩坐。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全詩帶出無以為家的不安定感，以及謫居黃州初期惴惴不安並無以抗拒的命運無奈之感。宋·蘇軾：〈遷居臨臯亭〉，《蘇詩彙編》，頁 872-873。

<sup>58</sup> 宋·蘇軾：《寒食詩二首》，《蘇詩彙編》，頁 932-933。

「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sup>59</sup> 此處風浪之大平日也不能輕忽，更何況大雨來臨之時，臨岸必定風雨飄搖，隨水高漲的大江更成為危害居所的天災。此時的臨臯亭被水霧之氣包圍，如魚舟般浮沈不知未來將會如何。汪師韓評前四句為「極荒涼之境」，<sup>60</sup> 可見蘇軾小屋化為荒涼之地，王十朋則引次公言「君門深九重」二句：「言欲歸朝廷邪，則君門有九重之深。欲返鄉里邪，則墳墓有萬里之遠。皆以謫居而勢不可也。」<sup>61</sup> 無法歸家亦無法返回政治中心的憂慮讓蘇軾宛如大雨中的房屋漂浮，驚懼與無奈之情展露無遺。於此，房屋意象與蘇軾內心產生高度連結性，幾近雙關地相互映照，抽象的恐慌不安便具象於危險的臨臯亭之間。

另外，〈徐使君分新火〉更是藉由空洞寒冷的房屋展現了蘇軾內心焦皇失措、無所依恃的內心狀態：

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  
溝中枯木應笑人，鈇斨不然誰似我。  
黃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朵。  
從來破釜躍江魚，只有清詩嘲飯顆。  
起攜蠟炬繞空屋，欲事烹煎無一可。  
為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鎖。<sup>62</sup>

清明時節蘇軾獨獨一人坐於臨臯亭之中，此時的他身體姿態為端坐，帶出愁苦煩憂的思索樣貌。詩中不斷顯現飢荒與寒冷的意象，蘇軾分別以范冉和杜甫的

<sup>59</sup> 宋·陸游：《入蜀記》，卷4，頁107。

<sup>60</sup> 此評出自《蘇詩選評箋釋》，卷1，《蘇詩彙編》，頁933。

<sup>61</sup> 語出王十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6，轉引自《蘇詩彙編》，頁933。

<sup>62</sup> 宋·蘇軾：〈徐使君分新火〉，《蘇詩彙編》，頁934-935。

典故側面言說家中清苦無可食之狀。<sup>63</sup> 甚至拿起蠟燭「繞空屋」，屋內無魚、無菜亦無飯，空空如也，僅能以燭火作為光源照亮家屋空間的昏暗。藉由光線無所遁逃的充斥房屋內部反而更顯屋子的空洞無物，此時蠟燭的燈光難以照明蘇軾困窘的現實生活，隨著晃動的燭火似乎照映出更顯淒涼的蘇軾身影。此時臨臯亭的空洞與貧苦，伴隨著清明的寒意圍繞蘇軾，側面反映出他苦惱沮喪的心境。

元豐五年十月，蘇軾好友蔡承禧（1035—1084）任為淮南計度轉運副使，<sup>64</sup> 黃州在他轄屬境內，便藉機按鄰屬邑來到臨臯亭探望蘇軾。王文誥有云蔡景繁見臨臯亭空間不足，「回車院為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旁」，<sup>65</sup> 並於六年五月完成。二人書信中亦提及「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sup>66</sup> 蘇軾將新屋名為南堂，其地位於「臨臯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虛敞便夏。」<sup>67</sup> 亦見南堂得以避開臨臯亭西曬問題，舒適涼爽的空間似乎更加宜居。南堂的功能性仍未明，但就其地理位置猜測應近於臨臯亭，王文

<sup>63</sup> 「從來破釜躍江魚」一句出自《後漢書·范冉傳》：「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指單漏，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展現出蘇軾生活的貧苦。見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81，頁2689。而「只有清詩嘲飯顛。」一句則用典於《舊唐書·杜甫傳》：「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顛山頭之嘲諷。」蘇軾以此典故自嘲生活清苦。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90下，頁5055。

<sup>64</sup> 蔡承禧，字景繁，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與父蔡元導及蘇軾同榜進士及第。歷大理寺丞、知虔州零都縣、太平州司理等職，又累遷太常博士官，後出為淮南計度轉運副使，任內於黃州重遇蘇軾，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因病卒於泗州之行司。蔡承禧與蘇軾交遊可由蘇軾〈與蔡景繁十四首〉的書信中窺見一二，主要集中在元豐五年到七年間。另有蘇軾〈蔡景繁官舍小閣〉、〈名西閣〉可見二人往來，而蘇軾〈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一詩中則記錄二人共同出遊。其生平可詳見蘇頌：〈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蘇魏公文集》（臺北：新陸書局，1970年），下冊，卷57，頁9b-14a。

<sup>65</sup>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著集成總案》（四川：巴蜀書社，1985年），上冊，卷21，頁18-19。

<sup>66</sup> 宋·蘇軾：〈蔡景繁十四首之十一〉，《蘇軾全集校注》，頁6165。

<sup>67</sup> 宋·蘇軾：〈蔡景繁十四首之九〉，《蘇軾全集校注》，頁6164。

誥的說法亦為南堂為臨臯亭擴充居屋空間的說法增添可能性。此外，蘇轍所作組詩〈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可見其將新葺南堂與臨臯的空間意義重疊，<sup>68</sup> 亦可作為佐證。再者，由蘇軾〈南堂五首〉與蘇轍〈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可進一步爬梳南堂的地理位置與空間配置，及蘇軾於其中的日常活動描寫。可見南堂除了作為招待朋友的場所，亦兼有田園躬耕的功能，同時更是「書小字」、「養丹砂」的自處空間，在一派熱鬧氛圍底下仍保有自處的小天地，可以說是個多功能複合性的場所。

南堂立於臨臯亭以南不遠處，由〈南堂五首·其一〉可見此處建築大多西向，唯有「南堂獨有西南向」，<sup>69</sup> 也因為這獨特的座落位置讓南堂得以擁有更佳的臨河觀景。南宋人王十朋注南堂引《東坡圖》云：「南堂在州治南一里，俯臨大江。」其地理位置可臨臯亭的大江之景相應。而如同臨臯亭書寫中的大江意象，滾滾長江的浩瀚水相也未從南堂書寫中缺席。包括「臥看千帆落淺溪」、「掛起西窗浪接天」都描繪了淵遠流長的水日復一日奔走流逝之景，長江浪淘卷卷西接天展演出一幅廣闊的自然圖像，這樣的浩蕩之氣開闊了蘇軾在南堂的描繪，也側面烘托了舒展的心境。除了大江開闊的景致外，南堂旁則是田居農家的清雅樸實佈置，例如東塢荷花池，四周亦有蘇軾躬耕的痕跡，延續了蘇軾於東坡開墾並寄寓躬耕的心靈。

總之，由臨臯亭與南堂共同展演蘇軾家庭空間對外的重要意象。除了安放家人與親友，偶爾亦是他自處內心世界的場域。由時間軸來看，關乎臨臯亭的書寫大約集中於初遷居的元豐三年到五年間，元豐六年後所建之南堂似乎部分承接了臨臯亭的居所空間意義，不但展現作為家屋的意義，也展現了此時蘇軾心

<sup>68</sup> 宋·蘇轍：〈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清·查慎行補注，王友勝校點：《蘇詩補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頁653。

<sup>69</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一〉，《蘇詩彙編》，頁966-967。

境的轉變。另一方面，上文提及於隨著時間轉變的雪堂書寫進而展演的蘇軾心境，似乎亦可以承接於南堂展現。

## （二）南堂日常起居：熱鬧紛擾的社交圖式與孤獨求靜的獨處空間

南堂組詩五首以多角度接入南堂空間與蘇軾空間中的姿態舉止。第一首首先由大處勾勒南堂的地理樣貌，第二、三首寫其自處時的閒情，第四首寫田園躬耕並與他人交往的熱鬧景致，第五首則位於自處與他人介入空間的轉換，呈現詩人自身於內外臨界的心理狀態。端從〈南堂五首〉中可以細梳蘇軾於南堂的活動，可粗略分為向外與他人往來交際的熱鬧景致，對象從親密的家人到鄰居好友，由此交織成一幅縝密的社交圖式，亦顯現他逐漸向外開啟的心靈。另一方面，則保有蘇軾獨自冥想的空間型態，南堂亦具有蘇軾獨處梳理內心紛雜的密閉式的靜態空間。

蘇軾與范蜀公（1008-1079）<sup>70</sup> 的書信中有言「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sup>71</sup> 此新居應當便是新建的南堂，除了

<sup>70</sup> 范蜀公為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官至翰林學士兼侍讀，累封蜀郡開國公，諡忠文。曾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而罷之。蘇軾與范蜀公交遊可見書信〈答范蜀公十一首〉，集中於熙寧年間至元祐年間，蘇軾亦為范蜀公作墓誌銘〈范景仁墓志銘〉。其生平可見《宋史》中〈范鎮〉，收入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十三》（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卷337，列傳第96，頁10783-10800。

<sup>71</sup> 見〈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二〉，《蘇軾全集校注》，頁5393。自筆者考證，應是在書寫南堂的建成，並修正李天祥《蘇軾的「際遇」與「懷歸」——以時間、空間為主軸的考察》文中將此條作為雪堂書寫。考其後文「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中的病症在其他尺牘中可作應證應為元豐六年的一場大病。〈與蔡景繁十四首之二〉中曾提及：「某臥病半年，終未輕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頁6158）考證為元豐六年六月所作，其中提及已病半年。而〈與李公擇十七首之八〉中亦言：「春夏多苦瘡癬、赤目，因此杜門省事」（頁5611）考證為元豐六年所作，其中症狀與〈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二〉相同，應指同一場病。因此推得此應作於元豐六年，又若為元豐六年已離元豐五年二月建成的雪堂相距至少十個月，應不能稱作「新居」，以時間點來

堂外的荷花池與栽種蔬果的園田外，更重要的是字詞間賦予了空間豐富的社交網絡意涵，南堂中有親朋好友與子女家人往來相聚，與外在環境形成一幅其樂融融且熱鬧的社交圖式，難怪蘇軾給予南堂「人間之樂不過如此」的高度評價。而這樣的景致在〈南堂五首·其四〉中有更詳盡的描摹：

山家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

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故人車。<sup>72</sup>

首先，此詩延伸出了相當縝密的社交網絡，往來南堂者有故人、居於當地的山中鄰人，顯現出蘇軾相較初貶謫時更頻繁地恢復了與社會的連結。當然貶謫以來蘇軾與朋友出遊並不少見，他仍然維繫著與文人好友的往來，但與黃州這塊土地間的聯繫卻未曾如此緊密。於〈別文甫子辯〉所記「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sup>73</sup>可見蘇軾初至黃州時與外界斷聯，並無舊識朋友，甚至與黃州本地鄰里全然無關的孤獨狀態。於此，南堂成為他與黃州土地、鄰里的重要聯繫場域。與此同時，家人的身影也未缺席其中。蘇軾與小兒出入田園蔬果間，營造出天倫之樂的一派融融。再者，南堂的田園生活都不若東坡躬耕時多半強調勞動與辛苦，更為凸顯自己躬耕老農夫的一面。南堂外的田居生活則偏向與他人的往來，包括「為割千房蜜」與「新畦五畝蔬」都強調蘇軾與他人的互動，顯現更為強烈的社會連結。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提出歸屬需要，也稱作社交需要(the need to belong)指出了人必須與他人建立並維持積極的感情關係，歸屬感亦是人的基本需求，與他人保

看，這裡的「新居」應該更可能是元豐六年所新建的南堂。

<sup>72</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四〉，《蘇詩彙編》，頁966-967。

<sup>73</sup> 宋·蘇軾：〈別文甫子辯〉，《東坡志林》（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1，頁23。

持社交關係可以讓人的情感需求滿足。<sup>74</sup> Baumeister (1953-) 和 Leary (1954-) 則提出歸屬感理論 (Theory of belongingness, Baumeister & Leary, 1995)，他們認為透過強連結的互動與傳播行為能夠促進對於歸屬感需求的滿足。這些近代心理學研究都指出，人需要保持和他人的關係進而與社會連結，對群體亦有歸屬感的需求，包括親情、好友甚至街坊鄰居至於生活日常與他人的連結，這些日常性的連結皆使人得到社會歸屬感，並擁有更安穩的生活狀態。回頭再觀看此詩，雖看似僅以簡單的筆墨描繪與他人的往來交友，實際上卻顯示了至為重要的社交意義。蘇軾走出了自己設下的黃州牢籠，他已不再是初謫黃州失去社會連結而閉門自處的失意人，<sup>75</sup> 而願意敞開心胸，與黃州土地與人群產生強烈的連結感。

除了蘇軾對外的交友空間拓展，組詩中也時常窺見蘇軾獨居於南堂時的起居生活，於下以蘇軾獨處時的活動進行探析。「身體是一切認識、感知的根源，而世界則是人所感知道的东西，身體在世界中展開的基本狀態，最重要的即是空間性的形成，人與世界的關係也由此建立。」<sup>76</sup>〈南堂五首〉除了表面書寫了蘇軾於此居所的日常起居之外，亦藉身體與姿態的描摹展現他更為開闊適意的心境。例如〈南堂五首·其一〉由外在地理空間的摹寫與建構後，最終詩句落在蘇軾身體姿態為「臥看千帆落淺溪」，<sup>77</sup> 躺臥之姿似乎可以與北窗高臥之淵明重

<sup>74</sup> 李霞、朱曉穎、李文虎：〈歸屬需要的研究進展〉，《心理學探新》第 30 卷 116 期（2010 年 4 月），頁 86-90。

<sup>75</sup> 宋·蘇軾：〈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作於元豐三年三月：「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見《蘇軾全集校注》，頁 5269-5272），又〈答李端叔書〉作於元豐三年，其中言「軾自喜見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見《蘇軾全集校注》，頁 5344-5349）都可見得初貶謫時期的蘇軾與外界多斷聯，害怕再度獲罪或是牽連他人，因而與社會失去連結。

<sup>76</sup> 蔡瑜：〈試從身體空間論陶詩的田園世界〉，《清華學報》新 34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頁 155。

<sup>77</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一〉，《蘇詩彙編》，頁 966-967。

合，以遠鏡頭的截取船隻飄浮、溪水流動與蘇軾身姿之景，展現出一幅身體的放鬆之姿並與景致謀合，讀者似乎也藉由蘇軾之眼得以觀看大江之景，與之五的江水有首尾呼應的效果。另外，此時蘇軾對自己身體狀態描寫為「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sup>78</sup> 可見此時蘇軾自我界定為暮年且多病。蘇軾當時應為四十八歲，與宋人進入五十歲便進入老年的普遍意識來說，蘇軾的確已經站在步入老年的大關之前了。<sup>79</sup> 而多病亦是他謫居黃州之後難以避免的身體傷痛，就此呈現他身體不可違逆的老化現實。<sup>80</sup> 但他卻不甘於現實身體之窘迫，以心理層面的反向操作以保有清晰的視力或是髮端常黑，這樣的身體描寫似乎可與元豐五年三月書寫的「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對應，<sup>81</sup> 彼時的蘇軾因連綿不斷的春雨由對時間逝去的無奈連結生理狀態，由內至外藉頭髮疏白展顯內心的苦悶。而〈南堂五首〉中的蘇軾實際更為年老，卻因心靈的輕快而使得外在反顯年輕，藉此產生身體與心靈的反差，顯出身雖老但心未老的心境狀況。

除了蘇軾在南堂中展現更舒緩的身體姿態外，更可以發現對於南堂的空間描寫內外相通的。承上一節可發現元豐五年時雪堂雖內外空間在相關書寫中時可窺見，但內外是不相連接，雪堂本身具有相當強烈的保護企圖。〈南堂五首〉中的空間則相對開闊，內外也藉由窗子作為連結，讓房屋內部的蘇軾與外界的陽光甚於景物能有所交流。有時候人的感官甚至突破房屋的封閉性，直接與外

<sup>78</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二〉，《蘇詩彙編》，頁 966-967。

<sup>79</sup> 吳志浩於〈宋代士人平均死亡年齡考〉中以宋代士人為群體統計其年齡變化線與死亡歲數，而以其中宋代士人人口死亡曲線與宋代士人人口生存曲線來看，「六十五歲是宋代士人的死亡高峰期」，而「宋代士大夫也往往認為四十歲方強壯，五十歲身體就開始衰老」。可以見得五十歲可視為宋代士大夫步入老年的重要年齡門檻。吳志浩：〈宋代士人平均死亡年齡考〉，《浙江學刊》第 4 期（2017 年 7 月），頁 170-181。

<sup>80</sup> 黃州之後多病，例如〈與蔡景繁十四首之二〉提及：「某臥病半年，終未輕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見《蘇軾全集校注》，頁 6158），而〈與李公擇十七首之八〉中亦言：「春夏多苦瘡癬、赤目，因此杜門省事」（見《蘇軾全集校注》，頁 5611）可見蘇軾於元豐六年便生過一場長達半年的大病。

<sup>81</sup> 宋·蘇軾：〈寒食詩二首〉，《蘇詩彙編》，頁 932-933。

界自然的風光相連。張燦輝曾論及窗戶的審美意義，強調窗戶使光線與空氣得以進入，且「密室實在並不是人類的居所」，他指出窗與門的連接讓家屋從密室中解放。<sup>82</sup> 由此來看，窗戶似乎讓一個房屋空間得以向外延伸並從密閉中解放，例如組詩中曾云「故作明窗書小字」，這裡的明窗不止是窗子，更是讓外在光線得以進入的媒介，明亮小窗帶來的除外在光線的清晰外，也為蘇軾帶來溫暖並開啟蘇軾於屋子中對外的視線。這樣開闊的視線在〈南堂五首·其五〉中能看到更細膩的展現：

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

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sup>83</sup>

細讀此詩可發現在展開對外景色的連接前，蘇軾首先將自己包裹在相對封閉的空間。掃地焚香後，他決定「閉閣眠」，這裡的「閉」字可見蘇軾向內封閉的狀態，並以帷帳為掩朝內形成一對內的空間，此時房間內部空間與蘇軾的狀態共構宛如安全島，而夢境於此成為包裹蘇軾的更微小的空間，藉由物理性具體的家屋以至抽象心靈的夢境，將蘇軾置入一安全無虞並脫離現實並不受外界侵擾的狀態。此時的空間近似元豐五年時的雪堂，但這樣的封閉狀態卻很快被破壞。遠來之客的到來驚醒了蘇軾，此時先點破第一層夢境的屏障。驚醒後靈魂似乎還未清醒，恍惚間拉離了置身其中的視野，夢覺之間，蘇軾一時失去的位置，此時的時間與空間恍若失效。此時詩中空間節奏相當緩慢，窗外的光與帷帳飄忽不定的拍打蘇軾，如煙飄渺若水微微浪動的帘帳在幾近停滯的空間中形成波瀾，

<sup>82</sup> 張燦輝延伸德國社會學家齊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空間的分割與聯結的角度討論了門與橋的說法，進一步拓展門與窗在審美空間中的意涵。張燦輝：〈分隔與聯繫——門窗現象學〉，收入孫周興、高士明編：《視覺的思想：「現象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110-117。

<sup>83</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五〉，《蘇詩彙編》，頁966-967。

空間呈現渺茫的滄桑感。至此展現的空間意識仍偏向私密與封閉性，但值得探析的是夢覺之際，蘇軾如何身體動作。面對這樣憂愁的空間感時，蘇軾主動打破這場凝凍的時空，自行揭開遮蔽物理空間的垂簾，藉由揭窗釋放自己的視覺封閉，也藉空間的縫隙讓外在大水的流動涉入房間之中，展演一場雙向性的釋放。一方面阻斷外界侵入家屋空間的私人性，另一方面卻也得以藉由窗的連接性得以「自發」的與外界取得關係。詩中，蘇軾出自自我意願的拉上了簾幕進入眠夢之間，卻也主動揭開窗子與外界聯繫。由此看來，「窗戶」明顯地在南堂成為蘇軾與外界的通道，即便爾偶躲回夢境虛幻之中，夢醒後仍記得為自己開啟一小道縫隙，將自己由狹窄的家屋空間釋放，並將身體與視線和外界聯結，與外界一同形成開闊的景色。

除了窗戶外，〈南堂五首·其三〉中蘇軾更直接藉由感官知覺行跨過物理屏障與外界連接，此詩恰好也是最能眼見蘇軾心境轉變之詩：

他年雨夜困移床，坐厭愁聲點客腸。

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sup>84</sup>

詩中時間感橫跨相當淵長，以他年與今時作為兩端點拉出明顯的變化線。他年心中滿是愁緒與客居之憂，身體動作由移床轉為坐姿，一方面當然是因現實既舊且污的破敗漏雨，另一方面「客腸」之語則揭露雨夜不能眠，因而只能獨坐愁苦滴滿腸，由身體姿態連接心理狀態，可見他年蘇軾是被「困」於一室之內，對此空間的心理反應則是「厭棄」，以「客居」的姿態與空間割裂出一幅斷裂的愁苦。而今同是雨夜，卻輕巧有致宛如一場雨後樂會，新瓦盛載著滴落不停的雨展開悅耳之聲。此時蘇軾的屋宅不再是一間無縫隙可闖的密閉空間，聲音與清香都可藉空氣傳遞，蘇軾身置屋宅之內卻與外在天地有所接，雨後的沁涼、叮鈴的

<sup>84</sup> 宋·蘇軾：〈南堂五首·其三〉，《蘇詩彙編》，頁 966-967。

點滴雨聲、或是荷花飄來悠悠暗香讓詩間遍佈疏而有致的密度，舒緩了蘇軾於黃州滿布傷痕的心靈，也鬆弛了客居他鄉貶謫後飽受窮困的身體。蘇軾藉由感官縫隙開啟屋子的密閉性，也顯現了他逐漸轉變舒鬆的心境。

即便此組詩中大多可見蘇軾舒緩的身體與心情，同時仍可窺見活動於南堂時的蘇軾獨處時仍不時以外在活動「靜心」。如〈南堂五首·其五〉中便提及獨處時的掃地與焚香，這些行為皆是藉由行動保持內心的平靜與安寧。例如掃除由空間的清潔保持乾淨，以延伸心理的乾淨與穩定，焚香則有靜心及養體的深刻意義。實際上在蘇軾的諸多作品中皆可見焚香的蹤跡，<sup>85</sup> 楊慶存、鄭倩茹認為宋人的尚香文化不但是宋代文人的集體認同，其中也含有豐富的文化意涵。焚香除了靜心讀書時增添雅境，亦具有養生價值，「香氣的氤氳繚繞之態，是由於他們認識到了香氣具有養鼻益脾、防護陰明經、保養健康的重要功效。」<sup>86</sup> 他們也進一步提出焚香與宋人德性修養間的關係：「焚香能發散出人體的污濁之邪，擺脫一切身心羈絆和世俗束縛，保持心性的端正與平靜，從而進入清心恬淡、順遂自然之境，體現出宋代文人對自我內在精神的修鍊與昇華。」<sup>87</sup> 回頭再看蘇軾詩中的焚香，一方面應和他貶謫黃州後於日常中反覆實踐的養生之事，更重要的是焚香帶來的靜心與反省作用。如〈黃州安國寺記〉中提及「焚香默坐，深

<sup>85</sup> 例如〈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中「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焚香淨客魂。」、〈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靜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繁不及備載。見宋·蘇軾：〈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蘇軾全集校注》，頁 769-772。宋·蘇軾：〈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蘇軾全集校注》，頁 1995-1997。

<sup>86</sup> 〈宋代尚香文化與人文內涵〉一文中討論宋代文人的尚香文化，並深入爬梳此文化內涵，包括宋代文人的集體認同感之外，士大夫亦以尚香正心慎獨、濡養德性，實際上是為儒家理想人格的實踐，透過此實踐溝通萬物，體現宋人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見楊慶存、鄭倩茹：〈宋代尚香文化與人文內涵〉，《東北師大學報》第 4 期（2019 年 3 月），頁 10。

<sup>87</sup> 楊慶存、鄭倩茹：〈宋代尚香文化與人文內涵〉，頁 7-14。

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作為印證，<sup>88</sup> 可以更明確的探知焚香圍繞著蘇軾的默坐自省，藉著雲煙裊裊間排出內心的煩憂與廢棄物，也排除在俗世間遭受的苦難，並藉此保持心性與洗淨心靈進而隨順平靜的儀式。焚香之際，他將自己安放於真空空間與外界隔離的狀態。由此來看，焚香當然也反映蘇軾黃州以來養生的生活要旨，更深層則是蘇軾療養內心的活動，並體現他的儒家修身實踐。

總之，對於蘇軾，掃除與焚香都帶有清理內心雜質與生活紛擾的意涵，藉由獨處的時空蘇軾洗滌內心的憂慮，而在此之後蘇軾便「閉閣眠」，並潛入夢境之中，讓他脫離現實以至於得以進入一虛幻空間的方式。這也許揭露了蘇軾仍時不時的被憂愁之感侵擾，藉著這條線索展現的是即便蘇軾展開了新的社交圖式，也在日常起居中顯現出更為寬為疏鬆的身體姿態，但烏台詩案與貶謫之愁仍在生活的陰暗面侵擾著蘇軾，他仍然必須以外在的活動安置身心可能遭遇的波動。但即便仍時而憂愁，更可以確定的是在元豐六年後大部分的空間書寫中都暗示著蘇軾已經逐漸走出困境。

#### 四、結語

元豐三年的蘇軾歷經烏台詩案後貶謫來到「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的黃州，<sup>89</sup> 內心的惴惴不安與惶恐如影隨形，並投射到文學作品與空間描寫之中。隨著時間沖刷現實的恐懼，元豐五年至六年間可以看到蘇軾內心由時而安定時而膠著的浮動狀態逐漸穩定，而這樣的心緒亦反映在蘇軾的住屋空間書寫之中，空間的封閉或開放、人身體姿態的蜷縮或舒展、蘇軾的身份形象轉變皆暗示著

<sup>88</sup> 宋·蘇軾：〈黃州安國寺記〉，《蘇軾全集校注》，頁 1237-1239。

<sup>89</sup> 宋·蘇轍：〈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蘇軾全集校注》，頁 5269-5272。

他的心境往往反映於這些家屋書寫之中，進一步探析這些文學作品得以為我們更細緻的揭開蘇軾此時期的內心動態。

元豐五年開墾躬耕的東坡是他寄託或雪堂的自我詰問，都可見得蘇軾處理並面對浮動心緒，而其中都夾帶「欲」與「將」而得以進入平靜的企圖。時間推進至元豐六年，南堂所建之時，「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sup>90</sup> 蘇軾於黃州的居所更接近「家屋」的概念而非暫時性的寓居空間。南堂的空間意義承接元豐六年以來逐漸開放的雪堂書寫，觀察〈南堂五首〉可以發現南堂內外空間建構較為開闊，並以窗戶或是蘇軾置身其中的感官作用將空間內外連結，將人由家屋中解放。於是，家屋不再是將人關入密閉的場域，而可藉由家屋主人的自我意志決定內外空間的開啟或關閉，由此也可窺見蘇軾逐漸彈性的的心境。攀循時間軸更可以發現夢境串連蘇軾這兩年的黃州記憶，元豐五年時的蘇軾在雪堂中的夢境「栩栩然」讓他無法忘懷，顯現對現實俗世的逃離與夢境的安靜意象。而元豐六年時置身南堂的蘇軾雖亦遊入夢境安放自己，「覺」後似乎頓失時間與空間感，一時恍惚中帶著些許惆悵之情，隱然暗示此時期的蘇軾仍未完全走出貶謫的灰暗沮喪，仍逃入夢境之中以求一「靜」。但夢覺之間，蘇軾揭起西窗任視線與外在大水景致相互交錯，在隱然的憂愁底下，蘇軾揭窗的舉動象徵著逐漸開啟心靈的自己。

若說元豐五年時初建的雪堂書寫反映了蘇軾拉起界線與防護罩的空間，那麼南堂書寫便是承接著元豐六年時在其他雪堂詩作中漸顯舒緩的空間。這裡呈現了蘇軾與友人相互來往、熱鬧歡快的社交網絡，也可窺見蘇軾藉由日常起居與生活姿態緩緩開啟的心靈空間。置身南堂中，雖仍避不開身老的事實，也必須忍受令人愁腸的雨夜，但蘇軾卻更偏好將南堂塑造為一個明亮的空間藉以舒展自己，此處可以明窗書小字，可以幽室養丹砂，亦可養蜂種植蔬食接待客人，組

<sup>90</sup> 宋·蘇轍：〈次韻子瞻臨皋新葺南堂五絕〉，《蘇詩補注》，頁 653。

詩展現出南堂在他生命中開拓的一個小小空間，可以自足紓憂，可以安放漸走向安穩的內心與自己。

我們也可以發現蘇軾形象與空間轉變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元豐五年時以農夫與散人的樣貌出現於居所之間，可以看出蘇軾在詩文中展現的蓄意與企圖。而到了元豐六年之際，田居生活也好、散人閒適的生活模式也好，在相關書寫中都不再具有那麼強烈的塑造企圖，而是以更為自然的姿態展現在空間書寫之中。進一步以時間軸的延伸來看，元豐五年時的蘇軾展現出的是一種「追求」適然的初始點，到元豐六年時的家屋書寫中則更偏向「處於」適然的曠達之情。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晉·郭象注，清·郭慶藩集釋，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鍔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 宋·蘇軾著，清·朱孝臧編年，龍榆生校箋，朱懷生標點：《東坡樂府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著集成總案》，四川：巴蜀書社，1985年。
- 宋·蘇軾著：《東坡志林》，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臺北：新陸書局，1970年。
- 宋·陸游著：《入蜀記》，收入王民信主編：《宋史資料粹編》第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 元·方回著，李慶甲集評：《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十三》，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 清·查慎行補注，王友勝校點：《蘇詩補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王水照、崔銘：《蘇軾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林語堂著，張振玉翻譯：《蘇東坡傳》，臺北：德華出版社，1979年。
-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黃啟方：《詩人·美人·文人：唐宋文學十一題》，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年。
-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6年。
- 〔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結構群譯：《人論》(An Essay on Man)，臺北：結構群，1989年。
-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05年。
- 〔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

### （二）單篇論文

- 何阿琚：〈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2008年10月，頁54-62。
- 方瑜：〈抉擇、自由、創造——試論蘇東坡的陶淵明〉，《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年5月，頁5-26。
- 李霞、朱曉穎、李文虎：〈歸屬需要的研究進展〉，《心理學探新》第30卷116期，2010年4月，頁86-90。

吳志浩：〈宋代士人平均死亡年齡考〉，《浙江學刊》第4期，2017年7月，頁170-181。

姚明今、徐宇春：〈蘇軾夜雨對眠意象闡釋〉，《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5期，2007年10月，頁559-563。

夏明宇：〈對話與突圍：蘇軾在黃州的空間書寫〉，《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9卷第4期，2017年7月，頁103-110。

張燦輝：〈分隔與聯繫——門窗現象學〉，收入孫周興、高士明編：《視覺的思想：「現象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110-117。

舒韶雄：〈景似情殊 境同感異——陶淵明〈游斜川〉與蘇軾〈和陶游斜川〉比較閱讀〉，《湖北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2006年3月，頁10-13。

傅含章：〈論蘇軾寓居定惠院之生活與心境〉，《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3期，2008年12月，頁111-131。DOI:10.6453/KMUJGE.200812.0111

楊勝寬：〈雪堂記與蘇軾黃州適意的貶謫生活〉，《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7期，2011年7月，頁1-7。

楊慶存、鄭倩茹：〈宋代尚香文化與人文內涵〉，《東北師大學報》第4期，2019年3月，頁7-14。

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年12月，頁257-272。DOI:10.6187/tkujcl.200612.15-8

蔡瑜：〈試從身體空間論陶詩的田園世界〉，《清華學報》新34卷第1期，2004年6月，頁151-180。

### (三) 學位論文

李天祥：《蘇軾的「際遇」與「懷歸」——以時間、空間為主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年。

DOI:10.6342/NTU.2010.01845

吳嘉敏：《元豐五年蘇軾文學研究》，吉林：吉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

何海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DOI:10.6342/NTU201800019

